

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这位老板说,这些人有的是药厂的,有的也是贩子。毛小姐所在的这类大公司不收的,比如虫蛀发霉的虫草,他们全都要。“当然价钱要压低很多,药厂拿回去磨成粉加工一下,做成虫草胶囊。”

毛小姐介绍说,除了虫草,现在辽参的销路也很好,“送辽参很时髦,糖泡的每公斤3000元左右。”而燕窝走势不太好,因为“当官的都不怎么相信燕窝是真的了,即使收同仁堂的燕窝,也只每克20元左右。”

“其实虫草的价格高,主要是礼品市场的需要,有多少人真的在吃啊。”毛小姐把这称为“循环消化”。“送礼,回收,再卖,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就在几个当官的家里转圈子。”

吃的不是补品,是身份

虫草、鱼翅、燕窝,“从古至今,中国的上流社会都吃这些养生。这就是有钱有权阶层的标志性高档消费品。”周梅森说。这些东西有医用效果?科学机构的主流结论是:并无奇效。但它们在礼单上依然很受欢迎。

为什么原始人喜欢胸前佩戴虎爪?为什么过去的贵族喜欢坐在虎皮上?因为迷信这样可以得到老虎的力量。周梅森解释道,这类似于一种原始信仰。而这种原始的因素,在当今的“上流社会”人士心目中,依然很有分量。

不过,由于地域和气候的差异,各地的补品偏好也有不同。东北的领导者特别喜欢虎骨酒配熊胆,“南方官员们就不一定认了。”曹保印说,“南方天气燥热,而且不流行喝烈酒,他们比较迷信蛇胆、蛇虫制品,认为有败火去湿功效。”

“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接受礼物的人不一定真的觉得有那么高的价值,不过只要这个东西难弄又珍贵,就能让消费者产生满足感。”周梅森说,“吃这种东西代表了一种身份和生活水平,所以这类珍贵补品才有市场。”

什么罪恶,什么流行

上世纪80年代,燕窝几乎是用于送礼的补品类第一选择,“那时燕窝需求量非常大,以至于雨燕都快灭绝了。”曹保印回忆。

因为公认只有雨燕的窝有极高营养价值,为了获得最好的燕窝,生产者就开始大规模捕杀雨燕。“以至于后来都没有真的燕窝了,但是送礼还是需要啊,所以造假就开始了。”各种染了色的“血燕”涌上礼品柜台。渐渐地,燕窝的价值因为假货充斥而大大贬值。“现在还有真燕窝,跟市场上卖的不是一回事,价格极贵,只在非常高端的场合才有。”

在燕窝之后独领风骚的,就是“后起新秀”冬虫夏草。但据毛小姐透露,“虫草的价格也是虚高的,过去因为少所以贵,然后大量挖掘,再后来出现了大批假虫草。”

在不久前有关《反虐待动物法》的国际研讨会上,一位学者担忧地告诉记者:“现在一些官员和富人中,以能吃到老虎肉、用虎骨酒而互相炫耀。”学者认为,规模性圈养老虎,然后再向市场输送老虎相关产品,这个行业会对野生老虎的数量带来灾难性打击。

虎骨酒、虫草、燕窝、鱼翅,精美的补品礼物包装盒背后,常常有触目惊心的利益链条。“官本位之下愈演愈烈的‘特供’之风,让送礼者绞尽脑汁地开发更特殊的新补品,制造更多新概念。但是,什么罪恶,什么就流行——这就是高档补品市场的基本规律。”周梅森气愤地说。

据《瞭望东方周刊》



在“送礼送健康”的口号下,很多高价保健品和珍贵药材似乎是专为“送礼”而存在的。“有些钱能买到,比如冬虫夏草、燕窝鱼翅;有些有钱也难买,比如虎骨熊胆。”周梅森概括,这些补品可以统称为“特需专供”。

近年来,媒体和动物保护组织多次“侦查”到全国各地存在着一批批类似的“特供补品生产线”。一些国家级保护动物制品被非法生产、地下流转,稀有高价(或无价),是这类补品的共同特点。

给官员送礼,要么为升官,要么为发财,越是非非法、地下的,越显送礼者“心诚”。“这就催生了一个‘特供’补品市场,官员时兴吃什么,送礼的就送什么,这个市场的起伏,是紧跟官场潮流的。”周梅森说。

原因在哪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认为,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还有许多问题未解决,如向有关机构报告、向公众公开和具体问责办法等,因此,在地方遇阻属意料之中。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是热门话题之一。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已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然而至今尚未正式立法。

任建明等把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为一场“革命”,“革命”已在一些地方进入进行时。

2009年5月,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随后规定范围内官员的财产申报在网上进行了公示。下半年,上海浦东新区出台试点县处级官员财产公示的意见征求意见稿。12月,重庆市在司法领域试点干部财产申报。

有人提出,公示家庭财产可从新被列为后备干部的官员、新提拔的官员起步,这样可减少阻力,推动变革。

“双新”或是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的突破口,消灭“特供奢侈品”灰色产业链的第一步。

谁在消费特殊补品

“当下官员们最流行的‘养生经’是:早上起床先吃三颗温水泡冬虫夏草,中午两条开水煮辽参,晚上再来碗燕窝。”著名官场小说作家周梅森向记者侃侃而谈他所了解的“官场新潮流”。

曾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还收名烟名酒拿到民航餐厅卖,一个春节就能收入10万元。”

古玩店、拍卖行是高层次贪官的变现银行,烟酒店是低层次贪官的ATM机,各有各的生财之道。

还有窍门左道: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原总经理聂玉河收到藏在鱼肚里的1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培训部原副总经理魏湘滨则在“好猫”烟里发现同额礼金;给国家体育总局管理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的月饼盒里装的是1万美元;一名官员将礼品干货篮摆在阳台长达一年,待纪检人员登门,他才发现篮子里是百万现金。

据反贪部门统计,节日、婚庆嫁娶、生日、搬家、生病,是给官员送礼的最常用借口,其中春节、中秋的节礼尤为“丰厚”。披上人情外衣后,那些有贪心的官员就往往在收受礼物的性质上是否受贿上分辨不清,而贪官则“抗辩”不已。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说:“都是礼尚往来,怎么会受贿?”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在“忏悔书”中写:“有180余人每逢年节给我送钱送物,不好意思拒绝。”

遭遇“抗辩”最厉害的是“雅贿”,一句“我以为是值钱的藏品”,贪官们据此瞒天过海。

贪腐官员拉动奢侈品消费

“雅贿”古已有之。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奸臣严嵩的受贿物品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象牙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图》起大狱而终不得。”

研究晚清官场会发现,晚清京官普遍受贿,并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节庆送礼是主要形式之一,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

比如,盛宣怀想升为尚书,其心腹报告,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

“官本位思想主导,升迁的决策权掌握在长官手里,下级不得不巴结上级,这就造成了官场送礼的习俗;而商人经营若得不到官府支持会遇到许多麻烦,商人贿赂官员,官员从中谋利,于是官商勾结。”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宽说,贪腐官员不仅是普通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而且是拉动奢侈品创新的一个原动力。诸如虎骨酒、天价烟和文物等,几乎是权力“量身定做”,可称为“特供奢侈品”。

财产申报能否成为突破口

特供官员的奢侈品经过环环周转,层层过滤而变现,这个过程已经在一次次实践中衍生出了日渐完整的“产业链”。

为“雅贿”变现服务甚至是一些古玩艺术品店的主营业务,类似的还有“专营虫草、燕窝、虎骨酒回收代售”的保健品店。而一些烟酒店门口树一块不起眼的硬纸牌:回收名烟名酒,也成了社会默认了的“行规”。这些半地下业务也会常因某些特定事件受到有关部门打

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局长文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一案,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死刑。

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曾被人称为“超级震撼”。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4504起,结案132808起,给予政纪处分37581人,其中省部级干部和中管企业主要领导10人,厅局级干部220人,刷新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年度纪录。

解读高官落马原委,大都是文强式“朝中有人做官,市场有人经商”的故事。除了赤裸裸收受现金,还有相当部分贿赂是通过一些特殊礼物的馈赠实现。

北京一家媒体曾随机抽取该院2005~2007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并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贿物”品种三变

改革开放以来,贪官接受的“贿物”历经三变。

纪检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贪官家称金银、数钞票,要当会计师;世纪之交,去查贪官家外有几个家,办案需要“狗仔队”精神;收藏热和文物市场量价齐升之后,去贪官家搜古董字画,得成为文物鉴定专家。

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昌硕、任伯年、谢稚柳、弘一、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青花缠枝莲小罐、青花灵芝纹瓜小罐、清粉彩花卉过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这是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公安局局长王天义落马时的查抄物品,华丽阵容媲美博物馆的馆藏目录。王天义于2002年被判判处死刑,而类似礼单在诸多反贪案卷中一再重现。字画古玩对应着某些干部“知识化”的需要,领时尚潮流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则对应着“年轻化”的需要。登喜路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说:“登喜路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政府官员喜爱的品牌。”

2004年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TOS眼镜带到北京王府井投石问路。斯蒂芬说,在LOTOS最大的市场日本,很多政府官员是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的主顾。他坚持认为,在中国,“这(政府官员)将是一块潜在市场”。

送礼手法“创新”

为了给“不太方便”在奢侈品店自由购物的官员提供方便,以奢侈品送礼行贿的手法也在“务实创新”。

奢侈品店的一个潜规则是,商人在店里开一个私人账户,这个账户代码在同品牌所有门店通用,如有“关系官员”购物,只要说出代码,就可将账单记在商人名下。

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烟酒店里寄售名烟名酒则是“小打小闹”。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

新闻时评

做官须记“三个一”

据说,国外有一位老太太,虽然她的儿子贵为总统,但她仍然以卖菜为生。有人问她:“您的儿子是总统,您为什么还要辛苦地卖菜?”老太太说:“总统是他的工作,卖菜是我的工作,他干工作是为了生活,我干工作也是为了生活,为什么要让他工作影响我的工作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一项保障官员廉洁的制度或法律,要想很好地落实,离不开所处的文化环境。笔者以为,身为领导干部,在严格遵守各种监督制度的同时,必须牢记“三个一”:定一条底线、添一些怕性、多一些忧虑。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给欲望设定一条底线,就容易犯错误、栽跟头,到头来一无所有。有人将腐化堕落总结为“三部曲”:一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二是“既然湿了鞋,就再洗洗脚”;三是“既然洗了脚,干脆洗个澡”。如此,最后肯定进监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给手下人算过一笔账:老老实实地当官,守著俸禄过日子,就好像守著“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尽。朱元璋的这个账算得颇有哲理,智者称之为“守井哲学”。

添一些怕性
中国古代有部法律汇编叫《九朝律考》,里面的第一条罪名就是“不怕”。人最可怕的就是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陈毅同志有句名言:“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一些贪官贪污受贿的钱多了,就开始担惊受怕:一怕职能部门“查出来”;二怕其他案件“带出来”;三怕“梁上君子”“偷出来”;四怕事业对手“盯出来”;五怕“染上人物”“咬出来”;六怕群众举报“喊出来”。

所以,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增加一些怕性。要自觉接受监督,把自己的一言一行置于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人没有怕性就容易忘乎所以,许多落马贪官的经历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多一些忧虑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居安思危,具有忧患意识,如此才能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才能看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而时时给自己敲响警钟,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此才能坚持廉洁自律,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和谐,才能化危为机,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人民群众幸福安康作出应有的贡献。张成刚



期待“楼市新政”挤破房地产泡沫

近几天,新一轮的“楼市新政”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将购买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到50%、暂停第三套及以上房贷、国务院发出“暂停炒地房企上市和再融资”……而这些政策的推出,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立竿见影:据报道,19日股市出现大幅下跌,楼市也出现抛售降价现象。

上月底新华社的“六评房价”被视为一个信号,连日来国务院楼市调控政策又是重拳迭出,这些都表明,新一轮的“楼市新政”似乎要开始见真章了。而从这些政策中我们可以洞悉,国家对于抑制房价、挤破楼市泡沫,集中在两大关键因素:一方面加强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管制,管住开发前端;另一方面则通过对个人信贷的收紧,防止投机者炒房,管住消费终端。

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近乎严厉的信贷管制宛如一记“杀手锏”。因为开发商都是通过项目开发,因此,银行信贷资金来实滚动式房

企的“后路”,一旦断了这条后路,房企囤地、惜售、捂盘、坐地涨价等泡沫链条也就面临破灭的可能。

如果说,通过严厉的信贷管制,能够从房产开发前端挤压楼市泡沫,那么个人信贷的收紧,则是从消费终端上控制房价泡沫的增长。比如购买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到50%、暂停发放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房贷,并且强调要发挥税收政策对住房消费和房地产收益的调节作用。这一系列针对消费终端的政策,将有助于抑制消费层面的炒房行为。如果要让房子不再变成投资或投机的工具,收紧个人信贷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综上所述,此次“楼市新政”无论是针对开发的前端,还是消费终端,政策层面上的考虑,都可谓不周全。房地产泡沫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开发前端的房企,作为消费终端的炒房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银行信贷资金能够通过

收紧信贷的方式,对制造房地产泡沫的首尾进行有效的制约,那么挤破房地产泡沫则指日可待。

但是,从推出的这些“楼市新政”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暂停批准”、“暂停发放”这样的字眼。这到底是楼市反弹的“伏笔”,还是政策过渡期的观望,却也值得思量。政府此番加大调控力度,能否挤破房地产泡沫,除了对开发前端和消费终端的通盘考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策的执行力究竟如何。

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近日也发帖炮轰房产商绑架了政府,直陈房地产泡沫之弊。不过,姜副市长说的还是有些片面,一是房贷房子不再变成投资或投机的工具,收紧个人信贷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二是,二则房地产泡沫的制造者不仅只是房企的开发前端,还包括消费终端的炒房者的狂热。而此番“楼市新政”对前后两端进行了强力调控,如果政策执行得力,不出现反复,那么绑架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之日,或许为时不远了。张勇

发言获罪

日前,湖南省双牌县政协委员、县委办副主任胡佐军大会发言,因涉及当地招商项目,使当地的县委书记郑相顺不高兴,由此被迅速停职。当地人称,书记生气的的原因是因为胡佐军发言调子过高,讲话口气像书记。一位委员称:“发言都会遭受处分,以后谁还敢讲真话啊!” 焦海洋图

高盛欺诈门问题有多严重

继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风波之后,高盛金融“欺诈门”案件又一次给脆弱的国际金融市场增加了几分寒意。很多市场投资者对此事产生了不少疑惑:比如,希腊危机和迪拜危机都是无法“躲”过去的违约事件,而高盛欺诈门事件都是美国监管部门“自找的”,尤其在美国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回暖之际,有必要再去折腾,翻老账让市场再起波澜?这种做法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但是,我认为,美国监管部门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了,因为市场的“玩家”就是认为只要风险的牵涉面足够的广,政府一定会履行“大而不利”的规律来挽救经济,否则,政府一定会陷入更尴尬的局面。而投机者们这种“道德风险”的行为如果事后被宽宥下去,那么今后金融市场靠“特殊的智慧”甚至是“内幕信息”就可以最终大肆无忌惮地进行财富掠夺,最终大众也会对这种所谓的“精英市场”深恶痛绝,对欺诈行为无所适从的政府部门失去信赖。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珍惜自己名誉的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高盛是否最终会被美国司法部认定为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欺诈者”,目前还很难判断。但是,在次贷危机中所上演的一出通过现代“金融工学”工具所开发出来的看似可以科学地“转嫁风险”的方法来掠夺社会财富的闹剧,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了。尽管事前很难发现这种“阴谋诡计”,甚至很多这样掠夺财富的表外业务在当时监管漏洞的情况下“合法”地被得逞。比如,在房地产市场繁荣的

时候,贷款人的信用条件被高估,资产的信用评级也随之被美化,于是,不知情的投资者为了寻求低风险的投资产品轻易地选择了信用级别高的产品或具有一流信誉的金融机构的“指导”,最终在金融工程的复杂性面前模糊了对风险的认识和警觉性,遭遇了危机所带来的最惨重的损失。而高收益却却要承担高风险这样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时,即使双方都有责任,即使法律存在漏洞,事后也应该重点惩罚那些“明知故犯”的精英阶层!否则,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的这种扭曲的社会治理结构一定会带来今后更加严重的弱肉强食的社会风气。
我坚信今天美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对的,它找准了这场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一场人为造成的“道德风险”闹剧!如果要造成全球性环境下应对发达国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的能力,就应该强化全球统一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以防止少数“精英”凭借自己擅长的金融工程的“智慧”来滥用和吞噬全球化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财富积累。 孙立坚